

# 古代碑刻集里的苏州商会

郭宇辰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苏州商会作为苏州大运河畔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的载体,在《苏州明清工商业碑刻集》中留下了较多的石碑等文化资源。从石碑文化进行分析,苏州各个同乡商会的信仰、慈善事业等篆刻记载从中分析现代商会的传承与进步。苏州商会与苏州段大运河的互动关系同样成为历史长河中重要的一环,透过繁荣的市井展现了商会发展以及美好愿景。

**关键词:**苏州商会;碑刻集;苏州经济文化

## 引言:

苏州商会自古以来就是苏州经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之际商会逐渐兴起,清末到民国初年,苏州还有50所会馆、公所。明清时期交通的便捷、生产力的发展为贩运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商会作为商人组织的依靠团体进行活动的重要形式,以会馆、公所作为活动场地,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按照作用分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的试馆,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三种。明清之际,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但是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目的是照应,保护同乡、同行的利益,以避免受到外界势力的欺凌。文字记载的碑刻集成为了后世探索商会建制、捐款等的重要史料来源。

## 一、苏州商会中的信仰

石碑作为过去承载着记录者希望名留青史的愿望的重要载体,由于书写文字的纸张、布绢以及早期的竹简、木简都没有石材坚实,所以尽管石碑文字不可能长而全,但它仍具有印证和补充历史的重要作用。重要碑石上的文字还会请书法家撰写,还留下了历代不少书法家的真迹,日常生活中的临帖也大多缘由石碑。苏州商会的重要资料就是在石碑上进行记载的,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的会馆建置这一子目中,从碑刻的记录中略览苏州各大会馆的建馆过程。商会碑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完全介绍商会本身,一种则以纪念出力者、歌颂地方为主,后者占碑刻集的主要部分。首篇《倡修江西会馆碑记》<sup>1</sup>就是较为典型的商会碑刻类型,“商贾辐辏之地,必有会馆”引出全文基本介绍情况,同时碑刻中还会介绍会馆的修缮情况,会馆在康熙四十六年建筑遭受虫蛀,所以摇摇欲坠亟待解决,此碑设立于康熙四十九年,号召同乡募捐也是契合标题“倡修”一词,在当时期望对于江西会馆进行重新修缮。碑刻中具体描述了修缮的过程,同时歌颂了神仙的作用,也是石碑的重要作用之一。石碑的最后就是各个官员的姓名,可能是管理时间内的官员督办,也算作是留名的一种方式。《岭南会馆广业堂碑记》<sup>2</sup>碑刻以介绍苏州的整体风貌作为背景开始,“姑苏江左名区也,声名文物,为国朝所推。而闻门外商贾鳞集,货贝辐辏,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岭南会馆之建,始于有明万历年间”<sup>3</sup>,会馆诞生于苏州的繁荣之中,姑苏、山塘等仍活跃在现代苏州建设的地域名词同样在那个时代也是熙熙攘攘,这也是会馆所在地的优势,“但傍仅数字,以为栖息。凡

岁时伏腊及接见宾客,皆于神殿宴会”<sup>4</sup>,虽然房屋并不算多,作为栖息之所,会馆内见面宾客的场所处于神殿之中,碑刻中描绘宴会场景“酒酣耳热,歌呼欢笑”,同时会馆内堂屋情形诉诸碑刻。而碑刻的主体部分则是各大商号和个人捐助的题名,“助金题名:山东武定州正堂何多学。江南金山卫正堂蔡国玖。锦昌号六十六两三钱、彩昌号五十四两八钱……”<sup>5</sup>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会碑刻。与此类似的还有全晋会馆、东齐会馆、江西会馆等,较多商会碑刻承担着记录对会馆建置有贡献的商号和人名的作用。而像武安会馆及陕西会馆等基本省去了建置过程,将内容放在对于会馆的介绍以及在会馆内进行的活动,比如说拜神、追忆乡俗“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sup>6</sup>。

这几篇碑刻略览下来,最不能忽视其中神灵对于会馆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商人对于神灵的信仰仍作为一种传统,尤其是福建一些地区对于神灵崇拜流传并且成为当地的特色风俗。碑刻中较多展现的神灵主要是作为祭拜的作用,会馆中神灵的作用是寄托了同乡属性下的会馆对于家乡的一种思念。商人拜神的传统十分悠久,古代生产力落后,人类对自然产生了畏惧和崇拜,便有了神祇信仰,各行各业的商人都有自己的神祇崇拜,而且这种信仰大多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经营工商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涉及到商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纳税等环节,环环相扣并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财运亨通是商人追求的目标,经商目标往往会与经商过程形成较大的反差,商人便会产生失落感,为了弥补这种心灵上的缺憾,商人神祇信仰便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种传统。<sup>7</sup>清代以来,关羽成为城市各个行业,特别是商业

的财神和保护神，被称为武财神，其是传统忠孝节义的化身，商人经商期望发财，并希望财德两全，关羽成为保家财而又有德行的代表。关羽之所以能成为人们普遍尊奉的财神，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关羽具有“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待人以勇”的人格魅力，在官方和民间的美化、神话下，至宋元明清之际，成为万民崇拜的神圣偶像，商人作为其中的崇拜者也对其尊敬。另一方面，工商业近代转型的困惑使商人感到精神上要有所寄托，明清之际所遇到的工商业的困难是商人面临的巨大挑战，精神支柱也十分重要，关羽这种保护神的作用也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免受外界经济力量的侵害。“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关公与其说是一位能够招财进宝的神人，毋宁说是一位集团文化的象征，对内它强调忠诚，对外它强调信义，对事业它强调勇敢地进取，在关公身上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精神，现在被用来服务于新的发展目标，这是我们民族企图用传统的道德秩序来规范近代经济行为的心理意识的公开表现<sup>8</sup>”，对于关公财神信仰的这样的评论似乎契合了民众心理和心态。

## 二、苏州商会的慈善作用

《昭文县为梅园公所卜建存仁堂给示勒石碑》中“卜建房屋，额曰存仁堂，以为徽人寄栖医病之所……”虽然本篇中仅仅提到了为徽人提供医病场所，并且取名存仁堂，但仍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商会已经有一定承担社会责任意识，存仁堂由众人捐赠而成。商人通过救济维持自己的名声，商会也成为了他们塑造个人形象的一种普遍的方式。近代商会沿袭了传统，虽然不如清末作为一方势力维护一方安宁那么重要，但其对于慈善事业与地方商业等贡献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近代商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环节，是连接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纽带。自清末新政以来，商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政治、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清末地方自治背景下，兴办的商会在慈善活动中特别注重与地方其他自治组织开展协作和分工。<sup>9</sup>近代商会作为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在促进本业、本地、本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会通过制定商规、调解矛盾、协调关系等手段，维护了市场秩序，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商会还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资金支持，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代商会也成为政治领域的参与者，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调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式，商会为国家的政治进步和社会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通过捐款捐物、兴办学堂、办杂志等方式，为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做出了贡献。商会的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也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和谐发展。近代中国商会慈善公益活

动主要借助三种方式，会馆的慈善事业的延续与发展、与地方自治机构协作进行公共设施的维护和其他慈善组织的联系。商会的慈善公益事业，一方面体现了工商群体的自律性和他律性，推动了工商群体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充裕了慈善公益组织形式，是我国近代慈善公益事业的有益组成。追溯既往的目的在于汲取经验和教训。发挥商会在慈善公益事业中的作用，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应是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慈善制度层面的引导和规范至关重要，商会应重视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动，从制度改革到机制创新，需要全社会凝聚共识，协力推进，开创社会组织公益慈善时代新篇章。

## 三、潮州会馆一同乡性的典范

《潮州会馆碑记》是碑刻集中较为特殊的一篇，潮州会馆的旧址目前也是现代苏州城保存较为完好的会馆建筑群。碑刻通过华丽的词藻铺垫了潮州会馆的诞生“五方士商辐辏，于是有会馆之设”，同时附有皇帝的赏识记录“乾隆十六年，恭逢皇上南巡……诸商跪迎于门外，天颜温霁，赏赐彩缎二十匹”，对于商人来讲，已经是莫大的荣耀，同时刻诸石碑以纪念，也是作为一种对于皇权的依靠，前言最后部分团结同乡，宣扬美德，表达美好愿景。而主体部分则以年份的形式记录了潮州会馆的产业，“康熙四十七年，契买周长庚市房一所，价银四千八百五十两……”基本以年份、所买物品以及价钱所处方位的方式记录，在苏州府内购置的房屋租金等都厘清，作为一种契约。同时有后序和后跋作为补充，作为潮州会馆内人员的体会，补充了其作为同乡会馆等进行管理的惶恐和期许未来发展。苏州地处南北交通转运点上，康熙到乾隆年间广东潮州府海阳、澄海、潮阳、饶平、惠来、普宁、揭阳等县商人在经营潮州会馆中仅购置房地就值银 30665 两，潮州会馆在全国各地皆有，苏州潮州会馆是国内现存潮州会馆中保存最完善与富丽堂皇者。当然各会馆碑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市镇间经济上的频繁往来沟通，苏州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发展出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在以地方命名的商会碑刻中，同乡性属性达到极致，可谓出门在外同乡成为了凝聚的一种形式，并且为同乡提供便利，感受家乡温暖。这在现代社会同样可以窥伺到一些脉络，虽然现在的家乡界限并没有过去那么的分明，但来自同一个地方仍共享家乡记忆和地方声誉。

## 四、苏州商会与大运河

苏州商会的繁荣离不开大运河的作用，碑刻集中繁荣的水道、桥梁也真正印证了水在苏州城交通的顶梁柱作用。清代前期，运河沿岸城镇的商业亦呈繁荣景象。在商业都会，会馆集中分布在商业区内，像苏州有半数以上的会馆分布在阊门外一带，可见会馆集中区域正是商业发达之区。可以说大商帮的发达依赖于托足在商业发达之区的会馆，这又推进了商业的更加发展。上海、汉口是晚近兴起的商业都会，因为会馆多为商人设置，

亦多为商人服务，故更集中于商业区。即使在江南新兴的商业城镇，商业会馆亦成为商业发展水平的标志。大运河苏州段稳定而畅通，苏州西部地区亦围绕大运河兴修了更多的水道及配套基础设施，建成了成熟的水网交通体系，促进了沿岸市镇与域内其他市镇以及周边广阔区域的联系。河道交汇处，成为货物转运集散的最佳场所，商旅、民居汇集。<sup>10</sup>在大运河水网交通的便利之下，对苏州市镇的影响，则通过加剧市镇流通，繁荣市镇经济，潜移默化地体现在许多方面。苏州商会的发展脱离不了大运河的影响，大运河作为重要交通枢纽成为苏州商会沟通的重要一环。明清交通运输以及运输线成为经济繁荣与苏州商会成型的重要一环。“吴之土风习俗，隋志详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亦无饥馁。”<sup>11</sup>封建时期的交通以水运为主，陆运辅之。明清时期的水路交通日见发达，无论是船只的进步还是水路交通线的发展，都为商会的贩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这种运营机制和大运河的关系也密不可分。京杭大运河在明清时期成为封建政府从江

南经济区吸取养分的“输血管”，大批量的河道因为漕运等经济命脉的运输而受到重视，因而频频得到修浚、整治，从而使临清、通州、苏州、扬州等各城市彼此连接进而与外界取得了更广泛的联系，成为了江南有名的市镇，直至今日也受到水乡文化的影响。无疑运河水运的便利使明清运河经济带成为明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同时海运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尽管有封建政府长期推行“海禁”政策，但技术的积累，经济力的推动都使沿海乃至内地的商人跨越法律的禁限，这也使得清朝明清陆上交通因为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国力与民力的增强而更显发达。水运与陆运相互配合，明清赋役制度的改革又不断地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度，使农村过剩劳动力能从农业中、从田地中走出来，走向市镇与工商业都市，从事手工业的或商业的活动，这已经说明了商业对农业的侵蚀以及农业与商业的互补共进发展。无疑，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势必把越来越多的人牵扯进来，以致每个人都无法生活在市场之外。运河的流淌也造就了苏州一大批市镇。

#### 总 结：

碑刻集作为古人认为最能流传千古的方式，在商会碑刻中其撰写姓名居多，纪念捐赠的人名、商号等，可以说被后人看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碑刻的目的，石碑也完成了其使命。通过现代商会的组织架构在碑刻集中摸索，在明清之际的商会中传承，现代商会同样起着规范市场的作用。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收费透明度。鼓励行政机关向行业协会商会购买服务，支持行业协会商会更好发挥作用。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商会没有失去原来的色彩，而是焕发出新的光辉。这也是透过商会历史形成经验带来的好处，商会中商人的优秀精神内核也值得大家铭记。悠悠历史长河，透过碑刻集窥见苏州商会一角。

#### 参考文献：

- [1]《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院等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 [2]《近代山东商人的经营活动及其经营文化》，宋志东，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 [3]《明清时期大运河对苏州市镇的影响——以浒墅、枫桥、平望为中心》，周明生，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
- [4]《财神信仰》，吕威，文苑出版社，1994年
- [5]《论我国近代商会公益慈善事业的运营机制及其现时代价值》，葛吉霞，卢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

#### 注释：

- 1《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院等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 2《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院等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
- 3《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院等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
- 4《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院等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
- 5《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院等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8页
- 6《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院等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2页
- 7《近代山东商人的经营活动及其经营文化》，宋志东，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56页
- 8《财神信仰》，吕威，文苑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 9《论我国近代商会公益慈善事业的运营机制及其现时代价值》，葛吉霞，卢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5页
- 10《明清时期大运河对苏州市镇的影响——以浒墅、枫桥、平望为中心》，周明生，苏州大学学报，2022年，116页
- 11《同治苏州府志百五十卷·首三卷·刻本》，冯桂芬，江苏书局，1883年，第61页